

全球史译丛

公司与 将军

THE COMPANY



ADAM CLULOW

AND

THE SHOGUN

[英] 亚当·克卢洛——著

朱新屋 董丽琼——译

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中信出版集团

全球史译丛

公司与 将军

THE COMPANY

ADAM CLULOW

AND

THE SHOG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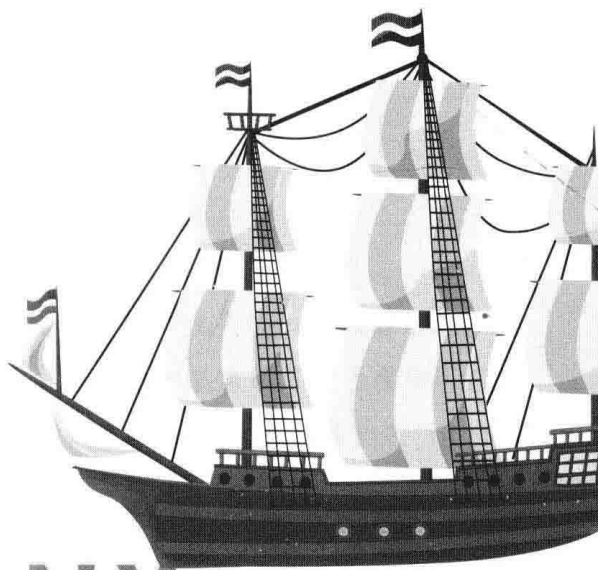
[英] 亚当·克卢洛——著

朱新屋 董丽琼——译

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 / (英)
亚当·克卢洛著；朱新屋，董丽琼译. -- 北京：中信
出版社，2019.7

书名原文：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ISBN 978-7-5217-0130-2

I. ①公… II. ①亚… ②朱… ③董… III. ①东印度
公司(英国)—经济史—荷兰 ②日本—中世纪史—江戸时代
IV. ①F755.619 ②K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4578号

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by Adam Clulow
Copyright © 201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

著者：[英] 亚当·克卢洛

译者：朱新屋 董丽琼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2.5 字数：360千字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印次：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338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130-2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Ⅱ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全球史译丛》

主编

刘新成

编辑委员会

李伯重 李庆新

梁占军 刘北成

刘家峰 刘文明

刘新成 施 诚

王立新 夏继果

向 荣 岳秀坤

“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 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 之后演变成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 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 1963 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 多年来, 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 2000 年全美已有 59% 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 5 年后又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 全国 26 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 14 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 2005 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 75% 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 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 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 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 2005 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 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 2001 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 在 2002 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 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 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 但同时他们也承认, 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 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 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 许多历史学家主张, 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

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 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

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

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 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 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

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

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

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

中文版序言

有机会为《公司与将军》中文版作序，我深感荣幸。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考察 17 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 VOC）在日本的经验，以及二者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遇。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日本获得了持久的商业据点，但是在德川幕府秩序边缘寻求一席之地的尝试却屡屡受挫。本书的三个部分，依次考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大使前往江户、在日本群岛周边海域发动海上战役、欲将中国台湾占为己有等问题。此外，本书还将以上问题与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在亚洲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了对比。

关于理解荷兰人在亚洲的活动及其地位的问题，前人已有卓越的开创性研究，本书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加藤荣一（Katō Eiichi）、永积洋子（Nagazumi Yōko）、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杰克·威尔斯（Jack Wills）等学者，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和高度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我在研究生期间最初接触到这些研究，并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近些年来，新一代杰出的年轻学者继承了他们开创的研究，包括欧阳泰（Tonio Andrade）、松方冬子（Matsukata Fuyuko）、玛莎·柴克林（Martha Chaiklin）、古拉姆·纳德里（Ghulam Nadri）、郑维中（Cheng Wei-chung）、杭行（Xing Hang）等学者。包乐史在这一领域占有独特地位，这些学者中不少人正出自他门下。尽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总结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研究的最新动向，但是撰写这篇序言确实给了我难得的机会，来介绍《公司与将军》出版前后涌现的新成果，

这些成果对我思考亚洲的荷兰商业帝国问题有着深刻影响。

首先要提到的成果并非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而是一个网站和在线数据库。它使得运用技术改变历史书写这一渴望已久却很难实现的目标成为现实。本书中很大篇幅聚焦于外交活动，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努力在东亚外交秩序中寻求立足之地。我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地位的转变，即从最开始临时虚构一位君主，到后来将公司塑造成德川幕府将军的忠实属臣。在我完成本书初稿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许多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的研究著作喷薄而出。这些著作对于包乐史撰写新外交史的强烈呼吁，无疑是一种回应。尽管有关外交活动的研究突飞猛进，但是最令人兴奋的一项新近发展，是出现了具有开创性的在线平台 *Sejarah Nusantara* (<https://sejarah-nusantara.anri.go.id>)。这是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Republik of Indonesia) 和科斯基金会 (the Corts Foundation) 合作的产物。这一强大的网络在线资源，使得收藏在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中的资源，包括《巴达维亚决议》(the Batavia Resolutions) 在内，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实现了对外开放；这也使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对有关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成为可能。

在资料丰富的 *Sejarah Nusantara* 网络平台中有一个板块是《外交函件 (1625—1812)》(Diplomatic Letters, 1625—1812)，这些外交函件清楚地呈现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外交活动的规模。该网站收集和整理了在将近两个世纪内与巴达维亚往来的大量外交函件。在浏览该平台界面时，首先震撼我们的是这些外交信函的数量之多。若用于写作，《外交函件》中可检索到的信函总数达 8568 件。此外，通过一个支持检索的目录，该网站还展现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保持通信往来的大大小小的不同政权模式，如从微型的海港政权到庞大的领土国家。尽管我试图在本书中阐明某一段时期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某个地区的外交活动，但是《外交函件》展现的却是整体外交活动，以及它是在荷兰帝国和以巴达维亚城堡为中心辐射出来的庞大外交网络的全

部范围中发挥作用的。学者们的许多研究项目和学位论文已经引用该资料，而且我毫不怀疑它在未来的研究著作中仍会被大量引用，所以它的潜在影响并非夸大之词。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大力感谢外交函件整理项目的所有参与机构，以及为这些资料的分类、复制和分析工作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 18 世纪末已经解体，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在巴达维亚建立了帝国总部，而且在安汶岛（Amboina）和班达（Banda）等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如此显而易见，所以本书主要将焦点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也就不难理解。但是近些年来，在上述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饶有活力且令人振奋的子领域。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过去十年间，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更广泛的中国海洋世界之间互动往来的研究大量出现。大约在我完成初稿的同时，另外三位学者也在撰写书稿，这些著作极大地开阔了我们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地区角色的理解。

欧阳泰是当今这一学术领域里成果丰富、影响巨大的学者之一，因其首部开创性著作《台湾如何成为中国的领土》（*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而广为人知。该书考察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如何转移到台湾的历史过程。欧阳泰在书中展现了一个复杂的荷兰殖民政权是如何以中国劳动力为基础，通过一个被称为“共同殖民”的过程建立起来的。^[1] 他的第二部著作——《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出版于 2011 年，当时我的书稿也接近尾声。欧阳泰在该书中对中荷战争（1661—1668）进行了细致分析，挖掘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成功及其掌控下的郑氏海上网络之间的针锋相对，进

[1] 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而重新评估了欧洲和亚洲之间海上力量势均力敌的状态。^[1] 我的研究主要关注法律以及法律标识的延伸如何限制了暴力活动，而欧阳泰关注的是暴力活动本身。《决战热兰遮》是对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军事革命”这一著名理论做出的回应，同时也是建立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该书对发生冲突的双方持中间立场，表明虽然欧洲人的确占有技术上的优势，尤其在要塞和船只方面，但是其扩张范围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广泛。^[2] 该书有两个重要成果：一是重新理解关于欧洲军事优越性问题的争论；二是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之间的冲突变成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个案，并且使其迅速成为所有世界史研究者的必读物。

另外两部关注郑氏集团的研究著作，与我的书稿大约在同一时间面世。第一部是杭行在 2015 年出版的杰出著作——《海洋东亚中的冲突与商贸：郑氏家族与现代世界的形成（1620—1720）》（*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1620—1720*）。该书主要以郑芝龙（死于 1661 年）和儿子郑成功（1624—1662）以及孙子郑经（1642—1681）三个人物有所重叠的传记资料为核心。郑氏家族三代共同建立了一个跨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强大海上集团，后来还在台湾西部海岸建立起一个具有明显的海上发展倾向的领土政权。杭行利用这些相互交叉的传记资料，首先指出郑氏集团成功地借用了中国的传统体制、机构和正统性，因此能够笼络商人和巩固商业利益；继而表明，郑氏集团能够将其转化为非常成功的政权体制，并在台湾建立起领土政权和“东亚海域的非正式经济霸权”^[3]。

我在本书中揭示并考察了中国商人在长崎递交的许多申诉。通过

[1] Tonio Andrade,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printed 1996.

[3] Xing Ha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